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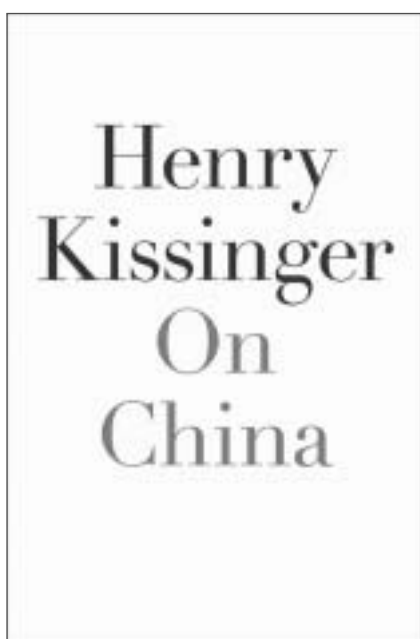
的文化生態環境作了多方面的評介，包括：家族成員的仕途成長與文化的傳承薰陶；地域文化的濡染涵養與特定時代國家體制腐朽、諸多領域蘊含重大變革；何紹基因政治權力的失落而轉向遠離現實的文化藝術領域等。作者通過爬梳傳統史料、地方志、家族實錄、文集、筆記資料，研讀了何紹基三百多篇文章、書信、手稿和兩千多首詩歌，成功地實現了時間縱向的家族史與空間橫向的主要家族成員活動的有機交織。

在何氏家族眾多人物中，《道州何氏》一書着重評析何凌漢以官風書品奠其基、何紹基以創造「何體」書法藝術而昌其盛，主次分明，顯現出曾昭薰的治史態度和對關節點的「把定」功夫。然此書涉及何氏家族眾多成員，有些成員如何紹祺、何慶涵等也頗有影響，因資料缺失而難免有所疏漏。但總體上看，此書較全面地展示了道州何氏書法文化世家的發展歷史與精神風貌，對研究中國近現代文化世家現象提供了飽滿而有深度的借鑒。

在何氏家族眾多人物中，《道州何氏》一書着重評析何凌漢以官風書品奠其基、何紹基以創造「何體」書法藝術而昌其盛，主次分明，顯現出曾昭薰的治史態度和對關節點的「把定」功夫。

從中國人的角度、根據親身經歷 理解中國

● 梁 志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1).

2011年5月，一本有關中國問題的專著在美英兩國同時面市，並受到西方世界和中國的極大關注，那便是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的《論中國》(*On China*，引用只註頁碼)。

牛津大學專攻現代中國歷史與政治的米特 (Rana Mitter) 教授評價道：這是一本「非同尋常、極具價值」的著作，「文筆優美生動、內容

《論中國》用三章的篇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中國的漫長發展歷程進行了快速的全景掃描。作者是以西方或美國作為參照系來探討中國的獨特性的。通過對比馬基雅維利與孔子，明顯可以發現前者強調權術，後者強調仁政禮教與社會和諧。

博大精深」(Rana Mitter, “Henry Kissinger Offers an Erudite and Elegant Insight into the New World Superpower”, *The Observer*, 15 May 2011)。《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著名書評人角谷美智子則認為，基辛格的這本新著「引人入勝、視角敏銳且時而有悖常理」(Michiko Kakutani, “An Insider Views China, Past and Future”, *The New York Times*, 9 May 2011)。耶魯大學著名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斷言，該書「野心勃勃」，「對中國二千五百年以來的外交和對外政策進行解讀，完整地回顧了中國的歷史，以闡釋當今的中國。」(Jonathan D. Spence, “Kissinger and China”,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9 June 2011.)在大洋的這一邊，《中華讀書報》也在第一時間對《論中國》的出版情況進行了連續報導(《中華讀書報》，2011年5月11日、5月18日)。

《論中國》一書確實具有獨特的魅力。作者基辛格兼具學者和政府決策人雙重身份，是1970年代初開啟中美關係和解大門的重要人物，與中國四代領導人均有過不同程度的接觸，過去四十多年訪問中國五十餘次，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或許正因為如此，他的這本新書既融合了大量的一手檔案文獻資料和最新的二手研究成果，又包含了很多當事人憶述的歷史細節和親身感受；既是一部歷史學著作，又是一部回憶錄。

該書除了序言、前言、後記和註釋外，主體內容共有十八章，大

體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到第三章)梗概性地闡述了中國古代的歷史文化傳統、軍事戰略思想、國際體系觀念，以及近代盛極而衰的痛苦經歷；第二部分(第四章到第十一章)重點討論了毛澤東的革命觀與國際關係理念，進而在此基礎上以朝鮮戰爭、兩次台海危機、中印邊界戰爭、中美和解等重大事件為線索，介紹了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上半期中美蘇三邊關係的演變；第三部分(第十二章到第十八章)着重探討了1970年代下半期至今中國的改革開放以及中美關係的變化。

基辛格在序言的結尾處斷定：「若要理解中國二十世紀的外交或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地位，必須首先對相關的歷史背景有一個基本的認識，哪怕可能會因此陷入過於簡單化的困境。」(頁3)基於這一考慮，首先，《論中國》用三章的篇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中國的漫長發展歷程進行了快速的全景掃描。作者是以西方或美國作為參照系來探討中國的獨特性的。通過對比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與孔子，明顯可以發現前者強調權術，後者強調仁政禮教與社會和諧。此外，中美兩國均持例外論，但美國所做的是四處宣揚和傳播自己的價值觀，「中國則從不進行觀念輸出，而只是接納他人前來求學。」換句話講，中國的對外政策基本上是防禦性的，並不熱衷於開疆拓土(頁16-17、20-22)。與此相關，西方推崇決戰全勝和英雄主義，中國卻

講究戰略合圍與持久戰，並因而更加重視軍事鬥爭中的政治和心理因素，追求「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境界，圍棋的制勝之道與《孫子兵法》的思想精髓清楚地體現了這一點（頁22-29）。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中國的國際秩序觀受到外部世界的極大挑戰。事實證明，「以夷制夷」、「遠交近攻」甚至是「師夷長技以制夷」皆不能拯救中國，中國無可挽回地淪為西方列強、俄國、日本爭奪的目標。直至一個半世紀以後，中國人民才再次「站起來」（頁57-90）。

接着，由於在中國的四代領導人當中，基辛格最熟悉的是毛澤東，因此《論中國》對毛時代着墨最多，共佔八章篇幅。基辛格認為，作為革命者的毛在觀念與實踐上是一個矛盾統一體：他倡導推翻舊制度、打破舊傳統，但在決策論證過程中卻又時常引用古代經典，並將儒家倡導的大同社會作為終極奮鬥目標；繼續革命的主張與構建大同社會的理想本質上互不相容，與中國終究要成為國際體系一員的必然趨勢亦彼此隔閡。新中國建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始終處於貧弱之中，毛卻出於維護國家長久安全和追求心理威懾的考慮相繼與美國、印度和蘇聯進行軍事對抗，令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深感意外（頁91-112）。

朝鮮戰爭中，中美之間第一次出現重大戰略誤判，自此惡性循環便開始了——「中國自以為是防禦性的舉動可能會被外界當成侵略行

為；反過來，西方的威懾行動則可能被中國解讀為對它的包圍。」（頁134）如果說基辛格對朝鮮戰爭的描述是深刻而精準的話，那麼他對此後幾年中美蘇三邊關係的解釋則多少有些令人費解。基辛格認為：「朝鮮戰爭結束後不到一年，毛澤東便在台灣海峽危機中與美國展開了軍事對抗。幾乎與此同時，他開始在意識形態方面向蘇聯發起挑戰。」（頁149）為了論證中蘇之爭始自朝鮮戰爭結束之初，基辛格列舉了毛澤東組織不結盟國家反對蘇聯霸權、公開說明相對於蘇聯而言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批判蘇共二十大等例子（頁163-66）。正是根據這一判斷，基辛格才將該書第六章的標題設定為「中國同時對抗兩個超級大國」。

不可否認，從內心的角度講，朝鮮戰爭停戰後，至少從1950年代中期起，毛澤東已經產生了挑戰蘇聯的念頭。然而事實上，中蘇兩國爭奪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的鬥爭發端於1958年（參見沈志華：〈毛澤東、赫魯曉夫與一九五七年莫斯科會議〉，《歷史研究》，2007年第6期，頁82-109）。從這個意義上衡量，「中國同時對抗兩個超級大國」似乎更適合於概括1960年代而非1953至1960年中國對外政策的主要特徵。

進入1960年代，中國先是同印度打了一場邊界戰爭，接着又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對外關係亦隨之陷入混亂之中。在描述這段歷史時，基辛格提出了一個問題，即「二十

基辛格認為，作為革命者的毛澤東在觀念與實踐上是一個矛盾統一體：他倡導推翻舊制度、打破舊傳統，但在決策論證過程中卻又時常引用古代經典，並將儒家倡導的大同社會作為終極奮鬥目標。

1960年代末，對中國而言，文革正值高潮，邊境戰雲密布。與此相類似，久拖未決的越戰也令新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內外交困。於是，中美兩國幾乎同時醞釀改善雙邊關係的舉措。

世紀60年代中美兩國是否失去了一次和解的機會？向中國的開放是否能夠更早一些？」(頁197)。他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基辛格看來，雖然肯尼迪 (John F. Kennedy) 和約翰遜 (Lyndon B. Johnson) 政府均考慮過緩和對華關係的可能性，並為此多次做出試探，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也曾向周恩來等處於中共中央工作一線的領導人進言改善周邊國際環境，但毛澤東的革命思想及其在對內對外政策上的實踐徹底阻斷了中國與美國溝通的渠道(頁197-201)。

1960年代末，對中國而言，文革正值高潮，邊境戰雲密布。與此相類似，久拖未決的越戰也令新上台的尼克松 (Richard M. Nixon) 政府內外交困。於是，中美兩國幾乎同時醞釀改善雙邊關係的舉措。尼克松首先在就職演說中暗示希望推動中國融入世界，繼而通過巴基斯坦、羅馬尼亞和法國向中國傳遞願意舉行雙方高級領導人會晤的信息。相應地，毛澤東則在要求四老帥重新評估中國的戰略選擇之後同意與美國記者斯諾 (Edgar Snow) 談話，對美國伸過來的橄欖枝作出積極的回應，並「戲劇性地」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代表團訪華。1971年6月，中國和美國就基辛格先行秘密訪華達成協議。就這樣，華盛頓為了轉移國人對越戰的關注，北京為了抵制蘇聯的威脅，雙方最終走到了一起(頁234)。

總的來說，在實際接觸過程中，中美雙方領導人決定暫時擱置

台灣問題(特別是中國不再要求美國立即從台灣撤軍)、淡化意識形態分歧、共同防止蘇聯擴張。換言之，中美兩國均不再要求對方作出原則性讓步，只求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耐心地處理雙邊關係。惟其如此，北京和華盛頓才很快結成了特殊的「準同盟」——「並未將雙方對等的義務寫入法律文件，而是僅僅基於對共同威脅的相同認識行事。」(頁253、275-76)

當然，由於歷史文化、政治制度、國家處境，乃至領導人的性格特徵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中美兩國仍時常難以真正理解對方的說法和做法。例如，在高層對話期間，中國領導人一再表示不懼怕核戰爭、必要時將單獨對抗蘇聯，這令美方難於理解；同樣，中方也不認同美國的集體安全觀念和核戰略思想(頁287-90)。而且，在1972年「水門事件」(Watergate Scandal) 和1973年中國國內政治風向「左轉」的衝擊和影響下，1970年代兩國間的「準同盟」關係亦不時處於震蕩之中。即便如此，出於對國家根本利益的考量，雙方領導人還是堅持信守那些落實到書面甚至僅僅停留在口頭上的戰略承諾。

最後，《論中國》用七章的篇幅討論了毛澤東之後的時代。與毛澤東和周恩來相比，鄧小平給基辛格留下的印象是：談話喜歡直奔主題，極具務實精神，特別重視安定團結，努力倡導向國外學習(頁323-27)。為了避免「兩個凡是」可能造成的危害，從而為將來的改革開放

鋪平道路，鄧巧妙地將「實事求是」和「理論聯繫實際」提升到毛澤東思想根本觀點的高度。漸漸地，中國擺脫了「繼續革命」思想的束縛，走上了強國富民之路。與之並行的是，1970年代末中美關係實現正常化，美國還非正式地配合中國發動了對越自衛反擊戰。接下來的十年裏，蘇聯漸趨衰落，中國轉而同時與兩個超級大國接觸，中美「準同盟」退化為「僅就某些利益一致的特定問題進行合作的權宜夥伴」（頁394）。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北京與華盛頓之間的溝通雖未中斷，但始終無法達成諒解，相互關係迅速跌入低谷。後冷戰時代，隨着中國的崛起，中美兩國間的相互合作和依賴不斷加深，但矛盾和衝突亦時有發生。

那麼，基辛格對未來中美關係的設想是怎樣的？在後記中，他表達了如下看法：協調一致的中美關係對全球穩定與和平至關重要，「兩國間的冷戰將阻滯太平洋兩岸一代人取得的進步」（頁522）；「中美關係不必也不應成為一場零和遊戲」（頁523）；「美國與中國之間決定性的競爭更可能發生在經濟和社會領域，而不是軍事領域」（頁525）；「對中美關係的適當概括應該是『共同進化』而非夥伴」。所謂「共同進化」是指兩國專注於國內事務，在求同存異的前提下展開合作，避免衝突（頁526）。基辛格認為：如果說四十年前的中美和解曾「震撼世界」，那麼如今兩

國應齊心協力地去「建設世界」（頁530）。

《論中國》告訴我們，基辛格並非完全贊同中國領導人的對內對外政策，但他確實在竭盡全力地從中國人的角度、根據親身經歷理解中國。例如，作者時常聯繫圍棋文化所隱含的對外界圍堵的敏感和準備打一場持久戰的決心來認識中國領導人的戰略判斷，又不斷援引《孫子兵法》中強調的「勢」和心理、政治因素來解釋北京出其不意的攻勢。再譬如，基辛格認為，西方並不一定能夠將人權和個人自由觀念照搬到中國這個擁有幾千年文明的國家中，也不能武斷地引用西方的啟蒙思想來說明中國對政局混亂的擔憂不合時宜。反過來，中國也應該意識到人權是美國基本價值觀念的一部分，美國必然從民主的層面出發對事物做出判斷，甚至情願為此損害實際的國家利益（頁426-27）。恰恰是由於不斷在中美兩種文化間穿梭往來，基辛格才能比絕大多數美國人更了解中國，才能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兩國間的關係是「合則兩利，鬥則俱傷」。

最近，《論中國》的中文版問世了（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中譯本的出版必定讓廣大的中國讀者更好地了解這位「老朋友」及其所在的國度，筆者猜想這也是基辛格本人樂於看到的，或者這原本就是他寫作此書的目的之一。

基辛格並非完全贊同中國領導人的對內對外政策，但他確實在竭盡全力地從中國人的角度、根據親身經歷理解中國。如此，他才能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中美兩國間的關係是「合則兩利，鬥則俱傷」。